功勋彪炳史册 精神永垂不朽

本报评论员

今天是我国第一个以法律形式确定的“烈士纪念日”，各地烈士陵园和纪念馆将举办公祭活动，各界群众也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对烈士的追思。

把国庆节前一天确定为“烈士纪念日”，意义深远。自近代以来，为了争取民族独立、人民自由幸福、国家繁荣昌盛，无数英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没有先烈们的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就没有新中国；没有英雄们的舍生取义、奉献为民，就没有如今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的美丽图景。缅怀千万烈士的丰功伟绩，寄托对先烈们的无限哀思，更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、国家繁荣富强来之不易、人民美好生活来之不易。

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，先辈们的精神需要我们代代传承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烈士精神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当前，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，各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、互相渗透，实现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，需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，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。“烈士纪念日”正是培养公民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重要平台，烈士精神将为我们奋勇前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精神动力。
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”烈士们将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追求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事业中，将热血洒在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征程中。烈士精神的“养分”将不断滋养中华民族的血脉，丰富伟大民族精神的内涵，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勇往直前。

烈士的功勋彪炳史册，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！

创新监管应相互促进

戴蔚珑

第十八届国际银行监督官大会近日在天津举行，来自90余个国家和地区、120家银行监管机构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代表在这一平台上交流监管经验。

创新与监管看似是一对矛盾：创新伴随风险，而监管意味着权力应受到制约。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，即使创新与监管存在短期利益冲突，只要博弈重复多次进行，两者就能达到“合作”的均衡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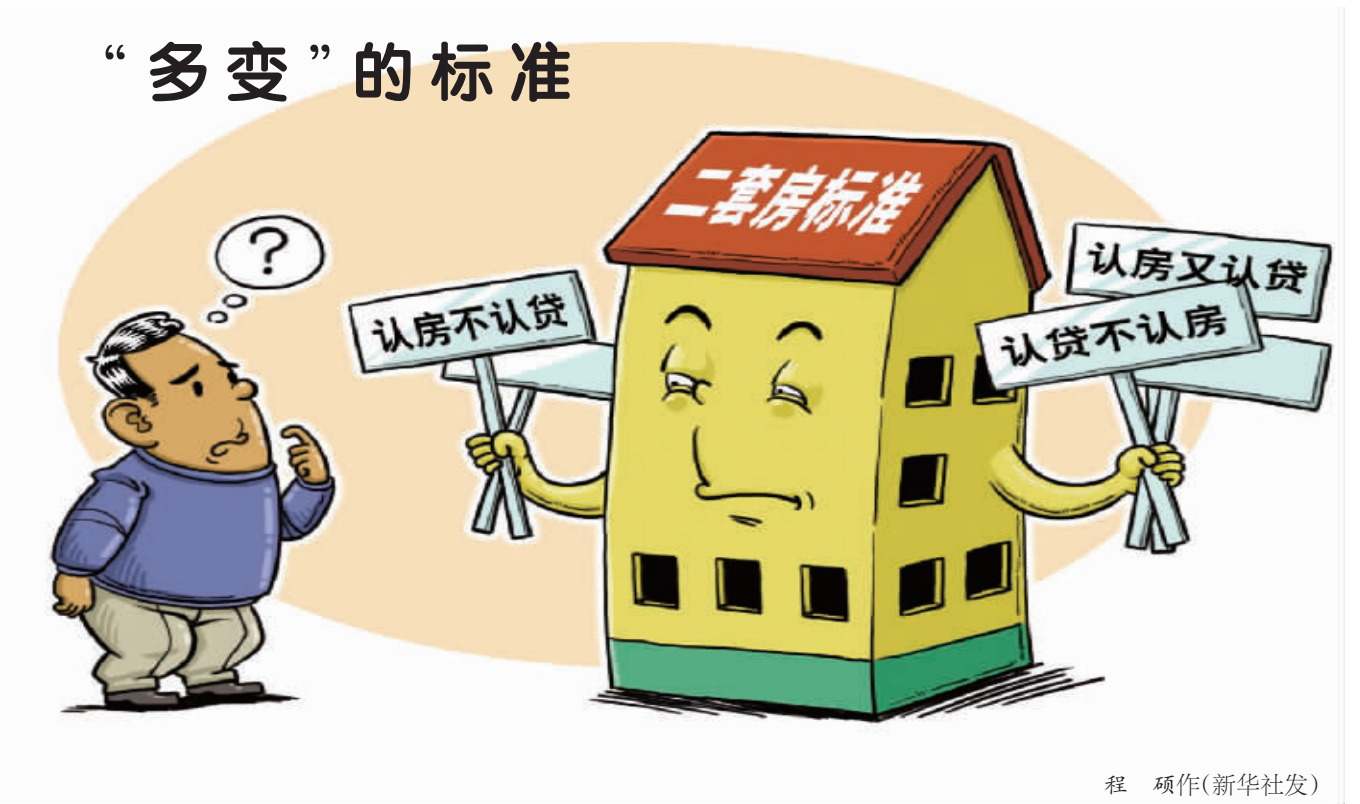
银行业监管当局通过规范和约束引导创新走上正轨，为金融业提供发展动力。而诸如影子银行等创新金融产品，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，也不断冲击现有的监管制度，对其提出更高的要求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创新和监管就像是赛跑，是相互激励，而不是相互羁绊。

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，中国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区别明显。相比于美国“先创新后监管”和“不出问题就不监管”的模式，中国则是“先监管，后创新”、“可能出问题就推迟创新”。可以看出，美国求“快”，而中国求“稳”。

国际金融危机中，我国金融监管总因其“严苛”而保障了银行业稳定。尽管在非常时期，政府对市场的强力干预行之有效，但中国金融市场创新滞后，不能总躲在看似坚不可摧的监管制度下寻求庇护。面对创新，监管部门应不断做出相应努力来减少盲点，完善监管体系，而不能止步不前，抑制经济活力。中国的监管政策应致力于为银行业提供安全保障，给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环境，进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，推动银行业改革转型。

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，银行业也不例外。通过不断增加金融产品，银行业也可以创造出新的增长点。在此过程中，监管需要未雨绸缪，更要解放思想，鼓励创新。

笔者认为，创新与监管在博弈中不断进步，时刻处于动态平衡之中。从监管的角度讲，监管当局须有“赛跑”的意识，在自由和适度之间把握平衡，既要允许“看不见的手”激发创新活力，又要有“看得见的手”把控风险。唯有这样，才能变创新与监管的零和博弈为双赢博弈，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。 （《农村金融时报》供稿）



程 硕作(新华社发)

从“认贷不认房”，到“认房又认贷”，再到“认房不认贷”……近年来人们发现，二套房的认定标准几经变动，一些地方甚至一年两易，前后标准又截然相反。二套房俨然成了“任人装扮的小姑娘”。每一次关于二套房的标准和政策变动，背后都不缺少“利益”的身影，并直接催生出一系列市场反应乃至“假离婚”等怪相。在当前楼市低迷、许多城市退出限购的背景下，二套房认定标准的任意变动值得关注。 （时 锋）

国企应善于探索商业新模式

孟群舒

摘英 Digest

在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界盛行一种观点，看一个企业是否值得投资，首先要看它的商业模式。商业模式就是赚钱的方法，对企业来说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然而，高度市场化领域里最为关注的商业模式，在国企转型和改革中却较少提及。这当中，业内人士可以说出很多原因。比如，从功能看，国企的经营目标不只是赚钱，还要服务于国家战略，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等等。言下之意，国企不可能像民企、外企那样，一门心思考虑怎么赚钱。从企业内部机制看，情况就更复杂。最为关键的是，新商业模式的探索，存在着不少风险。有国企人士坦言，创业企业烧的是风投的钱，失败了也不要紧；但国企投资或转型失败，那就有可能担上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。此外，一些国企在行业地位和资源配置上的先天优势，也使得它们不必像创业企业那样反复考虑盈利模式问题。

不过，不管国企们愿不愿意，移动互联网发展和大数据的普及，已经对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提出了新要求。在传统企业眼中毫无资源可言的互联网企业，依靠移动互联网这场技术革命，精心设计自己的商业模式，用互联网思维整合着线下实体资源，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，对传统企业实现了包抄阻击，并迅速做大做强。此次备受全球瞩目的阿里巴巴赴美上市，就是例证之一。反观国内坐拥大量资产的本土零售集团，其市值连阿里的零头都不到。

当今商业社会的竞争，已经从过去的产品竞争、机制竞争，发展为商业模式的比拼。面对商业竞争的新形势，国企应该学习借鉴世界一流企业的经验，积极运用大数据等各类新工具，追寻产业链中最具价值的部分，不断完善自己的商业模式。若要等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发展为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对手，再来调整商业模式，为时已晚。

实际上，但凡企业，就应不断思考和完善商业模式。这不只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实现“基业长青”。本轮国企改革的亮点在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其目的也不只是增强国资在关键领域控制力，同样在于通过混合的机制释放企业活力，倒逼企业成为更健康更有活力的市场主体。

（原载于9月26日《解放日报》，有删改）

未雨绸缪方能赢得主动

李春霞

国际 International

分析人士认为，美联储要到2017年才能将利率水平调整至正常区间。以往教训警示我们，美国利率波动极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，国际社会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须未雨绸缪，加快经济结构性改革予以应对

美联储年内第六次议息会议虽未改变利率前瞻性指引，但暗示加息速度或将快于市场预期。分析人士认为，美联储要到2017年才能将当前接近零的利率调整至正常值。以往危机的教训警示我们，美国利率波动极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多米诺骨牌效应，国际社会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必须未雨绸缪，以赢得应对危机的主动性。

历史上，无论是拉美金融危机还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，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和资本跨境流动的推波助澜不无关系。因此，就应对升息冲击的紧迫性而言，发展中经济体任务复杂艰巨。

首先，发展中经济体的当务之急在于加快改革步伐，去除经济结构性痼疾，以免升息带来的连锁反应诱发地区性的经济危机。对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的新兴经济体而言，应加快转变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，提高经济增长的自主性，并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政策，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。

其次，面对“资金池”水位的持续下降，新兴经济体应通盘考虑资本流动管理政策，降低短期资本大进大出的风险。一方面可通过加息来提振本币汇率，降低短期资本流出的冲动，并将货币政策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调控，保持基础货币投放稳定；另一方面，对已经完全开放的新兴经济体而言，可采取特定的资本账户管制措施来抑制资本外流。对未开放资本项目的国家而言，在国际资本市场剧烈动荡的环境下，要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，审慎对待短期资本开放。

第三，新兴经济体应深化区域金融合作，联手建立相关应急机制，以应对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带来的新冲击。已有专家建议，金砖国家可提前启动原定于2016年启动的外汇储备应急机制，及早应对国际资本流动性收紧引发的冲击。还有专家学者提出扩大已有货币互换协议的建议，比如中日韩与东盟国家可进一步扩大《清迈协议》的货币互换规模，并将其延伸至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，以增强亚洲整体的危机抵御能力，等等。

第四，发展中经济体可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等多边协调机制，积极反映自身诉求，定期就美国金融、货币政策变化等与美磋商，敦促其承担大国责任，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政策沟通与协调力度。一旦地区或全球性宏观经济指标发生异变，新兴经济体即可借助国际机构平台，做到及时沟通、及时处理。

对我国而言，由于中美利差扩大等套利因素存在，国内并未出现资本外流的迹象。不过，这一趋势也存在不确定因素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，正好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金融改革加快相互叠加，这将更加凸显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。当前，我国必须做好充分政策准备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。一方面推动人民币与他国本币建立双边或多边互换协议，将互换有效期延长并支持互换资金用于贸易融资，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；另一方面以上海自贸区战略为核心，加快建设成熟的亚洲债券市场，以吸引资本回流，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稳定。

在全球经济复苏疲软、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下行的情况下，国际社会寄希望于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。我们可在做强制造业与服务业、实现引资与资本输出同步发展的同时，适时增加中高档产品进口，尤其是资源型、环保型商品的进口，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。

综合来看，鉴于美联储升息可能形成错综复杂的负面溢出效应，且不确定性会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加剧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应未雨绸缪，从政策及结构性改革等多个层面加紧部署，以防范美联储升息可能形成的负面效应。

观察 On Watch

让节日成为“洁日”

马洪超

国庆长假即将到来。从有关报道看，很多地方的纪检监察干部将在国庆期间明察暗访，严查各种不正之风，确保节日风清气正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抓住春节、中秋、国庆等重要节点，从具体问题抓起，严查顶风违纪行为，已经成为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、持之以恒反对“四风”的“常规动作”。既往事实也表明，节假日确实是考验领导干部的重要关口，“送还是不送”、“收还是不收”的问题考验着一些人的内心。一般说来，逢年过节时，亲朋好友之间相互馈赠礼物，本是人之常情。不过，一些人却利用逢年过节的时机，到领导干部那里“走动走动”，或“加深一下感情”，借机送物送卡（券）送现金。官场上的人情往来并没有亲朋之间那么简单，往往会牵扯到钱权交易、利益交换等腐败问题，历来为广大群众所深恶痛绝。

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和狠刹“四风”的深入，过节风气大为改善。不过，违规违纪、顶风作案的节日腐败事件仍时有发生，可见作风问题具有长期性、反复性和复杂性。这就要求抓作风建设必须常抓、抓长，始终保持高度警惕，严防各种腐败现象，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的好转，让包括节日在内的每一天都成为“洁日”。

让节日成为“洁日”，必须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，对于节日腐败线索，做到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绝不姑息，真正做到“零容忍”，不断提高节日反腐的震慑力。

让节日成为“洁日”，需要积极发挥群众监督作用，充分调动群众检举节日腐败的积极性，在全社会形成人人自觉抵制腐败、人人对腐败问题喊打的反腐倡廉浓厚氛围。

让节日成为“洁日”，根本上还是要加强法治建设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“笼子”，努力完成反腐败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变，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，做到干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。

把文明写在旅途上

王 晋

国庆长假即将来临，不少人选择外出旅游。不管是到国外，还是在国内，请别忘了带上“文明”。

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稳步增加，旅游休闲日益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。据统计，2013年，我国出境旅游达9819万人次，境内旅游32.5亿人次。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，即便是少部分人的不文明行为也会产生放大效应。

文明出游，需要每一位公民身体力行。珍视景区的一草一木，不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，不在景区乱刻乱画，不插队、不高声喧哗，这些文明行为看似简单，但许多人没有养成好的习惯，不文明行为屡见不鲜。在境外，部分中国游客的素质也经常被人诟病。

文明出游，需要各地景区科学预判形势，提升服务品质。去年国庆期间，九寨沟景区发生大规模游客滞留事件。因不满长时间候车，部分游客围堵景区接送车辆，导致上下山通道陷入瘫痪。游客认为，拥堵是管理不当所致。今年国庆长假即将到来，各地景区管理部门要对游客数量、高峰峰值有个科学的预判，并针对游客错峰管理、应急突发事件等作出细致的预案，责任落实到人。当游客人数达到峰值时，提前发布预告信息，并进行有效管理，避免信息不对称，造成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，引发连环后果。在游客集中的地方，设置垃圾桶、发放环保袋、摆放提示牌等，这些细致的安排方便了游客，并非多余。

“破窗理论”告诉我们，一扇破损的窗户如果没有及时得到修缮，就有可能引发其他窗户遭破损的连锁效应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也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，在一个环境优美、整洁干净的地方，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，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，不少人扔垃圾就不觉得羞愧。防止“破窗效应”，既要求景区管理者加大治理力度，营造整洁美丽的环境，也要求每个公民共同遵守相关秩序，从自己做起，共同营造“人人有道德、人人守公德”的良好氛围。

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预测显示，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，旅游市场将接待4.8亿人次，按可比口径，同比增长13%。旅游收入将达到2700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20%。北京、杭州、三亚、成都、西安、厦门、九寨沟、丽江、青岛等地将成为国内出游热点。对于热点地区来说，如何做好准备，让上亿人次的游客文明有序出游，这是一道对硬件和软件的综合考题。

文明出游，不仅“利人”，而且“利己”。如果每个人都做到文明出游，我们就能享受到更和谐美丽的环境，每个人的旅游品质就能得到提升。文明出游也是反映公民素质的镜子。从这面镜子里，世界不仅能看到一个国家的富强，更能看到一个国家的文明。这个国庆假期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交出一份文明和谐的答卷。

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、漫画，来稿请发至：mzjjgc@163.com。

本版编辑 牛 瑾 杨开新